

中国古代家规中的诚信思想

傅礼白

(山东大学 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中国古代家法中蕴含着丰富的“信”伦理思想,“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不仅是历代家法共同倡导的立身处世原则,还是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继承和传播诚信思想的过程中,家规起着将儒家精英们的抽象命题转化为民间话语的中介作用。在经济方面,家法既强调自身的诚实信用,也十分讲究运用法律手段提供信用保障。家法中体现的信用思想和制度具有鲜明的特色,是中国“信”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家法; 诚信; 民间

中图分类号: K203;B823;D9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839(2005)03-0069-06

The Ethics of Good Faith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anuals for Family Governing

FU Li-bai

(School of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 R. China)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anuals for family governing", abundant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ethical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which is upheld as an essential rule that human beings ought to observe and it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children's education. Good faith is emphasized as a moral duty, but at the same time law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guarantee of good faith in economic affairs. By translating Confucian masters' abstract teachings into popular discourse, the manuals helped successfully to disseminate the idea of good faith an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s.

Key words: manual for family governing; good faith; popular discourse

“信”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理念之一。孔子将其列入“四教”、“五德”之中,视为修身成人的要目。汉儒尊“信”为“五常”之一,赋予其神圣的自然法属性。从此以后,“信”便成为历代王朝大力弘扬的道德价值观念。一种社会道德观念的形成不仅需要哲人创建学说以奠定其理论基础,也需要行之有效的渗透机制完成其社会化的过程。在“信”观念的传播过程中,家规正是起着将儒家精英们的抽象命题转化为大众意识的媒介作用。

收稿日期: 2004-02-27

作者简介: 傅礼白(1956-),男,山东齐河人,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中国法制史。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中国古代的家庭组织承担着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多重社会功能。中国早期的法律系由家规发展而来,并带有家规的明显遗传。由于家族主义根深蒂固,家规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一直延续下来,而且由于国法所能调整的社会关系相对有限,家规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往往起着国法无法替代的作用。家规的功能在于维系家族共同体,它对家族兴衰安危的意义比国法更重大,自然也更容易被家庭成员接受。因此,家规是“信”思想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民间社会所接受的“信”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即来自于家规,所以,通过家规不仅可以更好地贴近平民大众的“信”观念,而且有助于从群体意识的角度观察“信”伦理的民族特征。

在中国历史上,训诫和规范家庭成员言行的有“家训”、“家戒”、“家法”、“家礼”、“家规”、“家仪”、“家教”、“家范”等,与之类似的还有族训、族规等,按其性质可分为纯粹劝诫性的和具有惩罚性的两类。本文无意甄别其异同与各自属性,为叙述方便起见,概以家规称之。

以诚信作为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在汉代确立的三纲五常伦理规范中,信是五常之一。历代家规都对这一核心伦理范畴予以高度重视,并根据不同情况对“信”的内涵做出了新的解释。在继承和传播“信”思想的过程中,家规起着将儒学大师们的抽象命题转化为民间话语的中介作用。不过,这一转化不是简单的翻译,不同时代的家规也有自己的理解和拓展,因此,家规中的诚信思想是丰富多彩的。

《周易·家人卦》是假天意来确立家庭行为原则的,卦词云:“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1](第303页,卷五,家人卦第三十七)是谓君子日常言语必须切合实物,居家行事要守恒不变。这里虽未直接说“信”,但言有物,行有恒,显然蕴含着“信”的思想。又云:“上九,有孚,威如,终吉。”^[1](第307页,卷五,家人卦第三十七)“孚”就是“信”,是谓家长应怀有诚信,威严治家。由此推测,早在殷周时期,萌生状态中的家规便已具有“信”规范推行和“信”思想普及的功能了。

后世家规将信伦理渗透于民间的作用更为明显。例如:胡安国是宋代理学家,其《与子寅书》说:“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2](第202页)。这里便没有繁琐的理论说教。忠信,是对动机的要求;“不欺”,是对言行的规范。“不欺”是验证“忠信”与否的标准,将其作为主旨和根本,强调的是把“信”落到实处。

家规中也不乏剖析义理的抽象思考,薛宣的《戒子书》中就演绎了人性与伦理的相互关系: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谓“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序是也。何谓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于伦理明而且尽,始得称为人之名。苟伦理一失,虽具人之形,其实与禽兽何异哉!^[2](第296-297页)

这种阐释的意义在于传承先哲思想,借助家训的诫谕功能,将“信”观念植根于家庭之中,使之成为社会群体意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家规的作用不仅在于使人知其然,有些劝谕性的家规还要使人知其所以然。在《袁氏世范》中,就有这样的解释:

今人有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见不闻,安然自肆,无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聪明不可掩。凡吾之处事,心以为可,心以为是,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处事,心以为不可,心以为非,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吾心即神,神即祸福;心不可欺,神亦不可欺。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因矧可射思?”释者以谓吾心以为神之至也,尚不可得而窥测,况不信其神之在左右,而以厌射之心处之,则亦何所不至哉!^[3](第70页)

神灵无所不在,人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均在其监督之下。所以,人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以“不愧心”作为立身处事的根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古人相信语言具有神奇的魔力。声音可以吓退野兽,可以呼唤家畜,当然也能上达天地神灵。祈祷、诅咒、盟誓,都是在利用语言求助神灵。因为言语的听者不仅是人,还有神灵。所以,食言不仅欺人,也是欺天。“神不可欺”,欺神必遭“天谴”、“天罚”,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后果呢?袁采的解释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这种注入了佛、道思想的说法无疑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心理威慑力。

一般而言,家规大都传承了儒家正宗的道德原则,但也不乏拓展,甚至有明显的背离。以诚待人是“信”德的基本要求,但在人际交往中如何贯彻这一原则呢?南宋吕祖谦的告诫是:“及人托于某处问讯于求,若事非顺理,而已之力不及者,则可至诚面却之;若已诺之矣,则必须达所欲言,至于听与不听,则在其人。”^[2](第236页)]襟怀坦荡,直言不讳,无愧我心,以自己的本真面对世人,这样的处事标准显然是对“中庸、恭顺”传统观念的一种超越,它根基于更加充分的道德自信,也使人具有更为鲜明的人格魅力。

“信”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各种与之相关的问题。“讳贫、伪贫”是人所常有的一种心态和做法,表面上看似乎与“信”无涉,但汪辉祖的家规却一语道破了两者的内在联系:“若以贫为讳,将饰虚为盈,必致寡廉不顾。至实己不贫,而伪为贫状,此在居家则欲疏亲简友;在官则图亏帑婪赃。鄙哉!不足道也。”^[4](第136页)]。弄虚作假,无论装穷还是装富,都隐含着不良的企图,最终使人“寡廉不顾”,所以,这是一种应当坚决鄙弃的行为。汪辉祖主张,在社会交往中“一切财利机关、婚姻撮合、知亲密友相商,自应各以实告”^[4](第138页)]。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儒家经典中是很少涉及的,而家规却着眼于身边细事的处理,将深奥的哲理变成了可以践履的具体规范,不仅给人以思想启迪和行为指导,还在推进“信”德社会化的过程中丰富完善了传统的思想学说。

履信守约是“信”的另一重要内涵。孔子释“信”为“言可复”,“复言”即实践自己的诺言。袁采的家训将这一道德要求具体表述为“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3](第68页)]。袁采的规定明显提高了“复言”的可操作性,而且要求更为严苛。履信守约不仅是个人主观努力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必要的客观条件,这就要求人们作出许诺和约定之前充分考虑自己的履约能力。因此,汪辉祖特别告诫其子孙:“假债济急,即当先筹偿之之术。与人期约,不可失信。谚云:‘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真格言也。”^[4](第101页)]就普通家庭而言,因一时窘困而借贷是难免的事情,若只顾一时之需,不思何以偿还,将来难免失信于人。

礼信关系向来是一个难题。先哲认为“直而无礼则绞”^[5](第78页,泰伯)];“质胜文则野”^[5](第61页,雍也)],所以要“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以待人接物^[5](第79页,泰伯)]。但“文胜质则史”,过度修饰就变得虚浮,甚至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有损于“信”德。即使孔孟于此也不免遭人讥讽。在这方面,有些家规的主张却不落俗套,更为可取。吕祖谦就主张在人际交往中“若事非顺理,而已之力不及者,则可至诚面却之;若已诺之矣,则必须达所欲言,至于听与不听,则在其人”^[2](第236页)]。这种于心无愧,直来直去的处事方法就值得推广。《药言》认为:“客气甚害事,要在有主。主者何?忠信而已。”^[2](第352页)]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活动主要是在亲属和乡邻之间进行,“碍于面子”常给正常的人际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情面和道义发生冲突时,关键是要坚持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忠信”。就是有再大的情面,如果事情背离忠信原则也不能“客气”。王夫之主张亲友之间“如有不是,何妨面责,慎勿藏之于心,以积怨恨”^[2](第418页)]。以能否坦诚相待作为标准,吕祖谦把言不忠信者称为下等之人,朱熹则把朋友分为“益友”和“损友”两类:“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褻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2](第229页)]。

诚信是发自内心的一种道德情感,它不依赖外界的客观条件,不应像商品一样用来进行交换。这就是说,我之诚信不能只是作为他人诚信的回报,也不应要求他人必须对等回报。信德要求先行自律,然后再谈他律。然而,“今世之人,能自省其忠信笃敬者盖寡,能责人以忠信笃敬者皆然也”。人人宽于自律,严于他律,社会信用也就无从建立。因此,袁采主张从我做起,“忠信笃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后望其在人者”^[3](第69页)]。换句话说,就是以“厚于责己而薄责人”的态度来处理人际关系。李邦献在《省心杂言》中提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须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而后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后恭。譬犹责人以信,然后报之以诚。所以立身之道,非求备于人也”;“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犹兄弟。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敌国”^[6](第239-244页)]。

家规定者多为官僚士大夫,使子孙后代出仕为官以光宗耀祖是他们共同的心愿,但他们也担心跻身仕途的子孙不肖,招引灾祸而累及整个家族。于是有的家规便为从政者专门定立戒约,对其职业操守做出规定。田母教子就是这样的一则家训。田稷为齐国宰相,收受下属馈赠的贿金百镒,送与其母。田母就此对其进行了一番训诫。在田母看来,“修身洁行,不为苟得”;“竭诚尽实,不行诈伪”;“言行若一,情貌相逼”,是读书明理的士子应有的品质;“尽力竭能,忠信不欺,务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洁公正”,是国家官吏必须遵循的职业操守。无论为士为官,诚信都是基本的道德要求。君主“设官以待子,厚禄以奉子”,臣子却



利用职权接受贿赂,这是“为人臣不忠”。君臣关系“犹为人子而事其父”,为人臣不忠就是为人子不孝。“不义之财,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6](第147页)]为官以“信”的思想在历代家规中都有所反映。北宋名相范仲淹告诫其子弟“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7](第98页)]。明朝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则宣称:“吾人立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对于子孙居官者,要求其“以孝悌为本,以忠义为主,以廉洁为先,以诚实为要”。^[2](第356-357页)]曾国藩则提出以“三不”为立身处事之本:“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人皆敬重。”^[7](第176页)]家规中关于诚信的这些训诫对于促使为官子弟信奉职守、廉洁奉公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一个家庭本位的社会里,家庭成员之间荣辱与共,利害相关,每个人都负有不可逃脱的家庭责任。历代王朝推行的继承、丁忧、荫庇、连坐等制度更从法律上进一步强化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在个人行为对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会造成直接影响的情况下,背信弃义、坑蒙拐骗的个人行为就可能使整个家庭陷入孤立、败落。因此,历代家规中屡屡强调“信”德就不难理解了。由于官方借助宗法制度维系社会秩序,家长管制家人的权威向来不乏行政与司法的支持,家规所拥有的实际强制力有时丝毫不逊于国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家规在“信”伦理社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应该给予足够的估价。

二

中国是文明之邦,历来重视文化传承和子女教育。中国古代的启蒙教育完全由民间承担。由于对教育规律的共同认识和对传统道德文化的一致认同,家规中关于启蒙教育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共性。这种约定俗成的启蒙教育体制,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某些民间法的特性,承担着规范启蒙教育的法律功能。诚信作为立身之本,自然是启蒙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一说到古代教育,人们想到的首先是“读书做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至少在家规中还难以见到对仕进的强调。“古人读书,取科第犹第二事,全为明道理、做好人。”^[8](第205页)]在古代长者们的心中,教育的首要目的并不是科举。“成才”是次要的,“成人”才是基本的。在《家劝录》中,刘棻规定:“若夫举子业,非可语于今日者,但修学明经,使知义理而已。”^[9](第247页)]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白事理,至于应举不过是题外之意。针对“士之为学奚先”的问题,徐桢稷回答:“其忠信乎。夫子之教主忠信。夫虽有庶美,无主焉丽?”^[6](第493页)]忠信是统率其他道德品质的主要德目。以忠信为“士之为学”的首要内容,实际上是将其作为“成人”的必备品质来进行培养。《药言》认为:“孝悌忠信,礼仪廉耻,此八字是八个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字,有八字始克成人。蒙养无他法,但日教之孝悌,教之谨信,教之汝爱众亲仁。”^[2](第348页)]张履祥教导其子:“忠信笃敬,是一生做人根本。”^[8](第254页)]这表明,道德完善才是古代教育的真正要义。

古人进行道德教育,背诵经书并非是惟一的方法。杨亿认为:“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入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古今,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仪、廉耻等事。……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6](第126页)]文中“养其良知良能”的“养”字,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德行培养的关键所在。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忠信等优良品质就会进入受教育者的身心。

“易子而教”是古已有之的教育理念,但作为一种制度规范则是在家规中首先出现。司马光《涑水家仪》要求家中“十岁男子,出就外傅,食宿于外,读《诗》、《礼》、《传》,为之讲解,使知仁义礼智信”^[6](第77页)]。《郑氏规范》规定:“子孙自八岁入小学,十二岁出就外傅,十六岁入大学。聘致名师训饬,必以孝弟忠信为主,期底于道。”^[9](第264页)]《家劝录》虽未明确规定住宿于外,但也要求“子孙六岁以上,便择老成有学行者教之”^[9](第247页)]。易子而教显然更有利于少儿脱离溺爱的环境,接受纪律训练,培养独立精神,学习孝悌忠信等伦理规范。

从小事做起,注意循序渐进是古代启蒙教育的又一特点。真德秀的《教子斋规》要求子弟在言语方面“朴实说事,毋得妄诞”^[6](第59页)]。实话实说是诚信伦理在语言上的基本要求。儿童自幼不说谎话,看似平常小事,但水滴石穿,积而成习,长此以往就会铸成人的品格习性。所以张履祥提出:“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学堂不敬信师友,欺诈傲慢,习以成性,望其读书明义理,向后长进,难矣。”^[8](第254页)]《家劝录》要求子弟“先知揖让尊卑之理,稍长教以孝弟忠信,使底于成立,无忝尔祖”^[9](第247页)]。



在家规中,系统的信伦理教育基本是在少儿启蒙过程中进行的,但个别家规中也出现了针对全体家庭成员的规范化教育。浦江郑氏自南宋开始合族同居,被朱元璋誉为“江南第一家”、“义门”予以旌赏。由一代名儒宋濂协助修订的《郑氏规范》要求家中成员每天早晨在“有序堂”集合,“令未冠子弟朗诵男女训戒之辞”。其《男训》云:“人家盛衰,皆系乎积善与积恶而已。……何谓即恶?恃己之势以自强,克人之财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这种日复一日的强制灌输,目的在于让人铭记“克人之财”是一种导致家道衰败的“积恶”行为,不仅会引祸及身,还会遗患子孙。《郑氏规范》不仅注意言传,更注重身教。例如,其对家长义务的规定是:“专以至公无私为本,不得徇偏。”“为家长者,当以至诚待下。”“不得私假,不得私与。”“子孙倘有私置田业,私积货泉,事迹显然昭著,众得言之家长。家长率众告于祠堂,击鼓声罪而榜于壁。更邀其所与亲朋,告语之。所私即便拘纳公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论。”^[9](第254-255页)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自幼耳濡目染,于诚信品格的养成是大有裨益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家训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是科学的:儿童六至八岁入小学读书学习,与现代教育体制完全吻合;对教学本质的认识是正确的:启蒙教育的目的是“明理”、“成人”,明白如何做人的道理,成为一个道德情操高尚的人。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启蒙教育,正是在社会上构筑互信型人际关系所必需的基础性工作。

三

中国人一向注重“信”的内在实质,不甚在意“信”的外在形式,有学者据此便论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经济信用的制度资源。这种认识揭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某种特质,但并不全面,至少从家规所提供的材料中,就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商业欺诈是任何社会都无法完全杜绝的一种丑恶现象。它毒化交易环境,增加交易成本,降低社会的经济道德水平。宋代著名家规《袁氏世范》便以“小人难责以忠信”为题,对当时存在的各种经济欺诈行为进行了揭露:

忠信二事,君子不守者少,小人不守者多。且如小人以物市于人,弊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湿润,肉事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语,止于求售,误人食用,有不恤也,其不忠也如此。负人财物,久而不偿,苛索之,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售,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售,至于十数期不售如初。工匠制器,要其定资,责其所制之器,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得,至于十数,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类如此,其他不可悉数。小人朝夕行之,略不为怪。^[3](第90页)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经营,公平交易,是人人都应具有的商业道德。那些唯利是图、轻诺寡信、见利忘义者,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害群之马,对这样的“小人”要严加防范。使“小人”的伎俩无法得逞,关键在于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来保护自己。所以《袁氏世范》一再告诫子孙后代注意交易规范。其《田产界至宜分明》条云:“人有田园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异居分析之初,置产、典买之际,尤不可不仔细。人之争讼多有此始。”《田产宜早印契割产》条云:“人户交易,当先凭牙家索取阍书砧基,指出丘段围号,就问见佃人,有无界至交加,典卖重叠。”《交易宜著法绝后患》条要求“凡交易必须项项合条,即无后患。不可凭恃人情契密,不为之防,或有失欢,则皆成争端。如交易取钱未尽,及赎产不曾取契之类,宜即理会去著,或即闻官,以绝将来词讼,切戒切戒。”^[3](第155-162页)商业交易中的形式要件在家法中如此受到重视,表明时人已经更多地依靠契约条款来维护交易信用,更多地求助于法律对背约失信者予以制裁了。

道德自律是维护商业信用的基本前提,与人为善才能实现经济活动的互利共赢。坑蒙拐骗不仅害人,最终也会害己。元朝《旌义编》中提出,在购置产业时要进行换位思考:“增拓产业,彼则出于不得已,吾则欲为子孙悠久之计。当体究果值几缗,尽数还足,不可与狙侏交谋,潜萌侵人利己之心。否则天道好还,纵得之,必失之矣。交券务极分明,不可物货逋负相准,或有欠者,后当索偿。又不可以秋税暗附他人之籍,使人陪输官府,积祸非轻。”^[6](第279页)违背诚信原则的交易后患无穷,因此决不能有“侵人利己之心”,法律手续“务极分明”,这才真正是“为子孙悠久之计”。



汪辉祖是清代名幕,其积多年处理各种纠纷之经验写成的《双节堂庸训》对经济活动中契约信用的保障问题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告诫。汪辉祖认为市场交易者的智力水平是大致相当的,绝不能自以手段高人一筹,“天下无肯受欺之人,亦无被欺而不知之人”。所以进行交易活动的最好办法是“以勿欺为要,人能信我勿欺,庶几利有攸往”。^[4](第112页)]汪辉祖还专门论述了建立信誉的重要:“以身涉世,莫要于信。此事非可袭取,一事失信,便无事不使人疑。果能事事取信于人,即偶有错误,人亦谅之。”^[4](第126页)]参加交易者都想多赢,因此,在利益分配上应当坚持公平原则,但斤斤计较的做法并不可取,“财利交关,最足见人真品。天下无不能计利之人,其不屑屑于较量,甘于受亏者,特大度包荒耳。显占一分便宜,阴被一分轻薄。故至亲、密友,簿记必须清白”^[4](第185页)]。大度包荒,这才是中国儒商的风范!也是迅速建立信誉的一条捷径。土地、房屋是古代家庭的主要财产,进行交易须格外谨慎。所以汪辉祖对其子孙特别告诫:“典卖田产,须确查户贯、字号、段落、四至、界址、佃人、租额、有无典买它处?一一分明。然后凭中立契。屋宅则间数、椽瓦、墙壁、门窗、正路、旁径,以及花木、砖石,凡宅中所有一切,均须记载清白。售主当面交割,然后受产,自无后患。如或爱得些小便宜,必有余累。弱者累在及身;强者累贻后嗣。十常居八九矣。”^[4](第95页)]

从宋朝的袁采到清朝的汪辉祖,在经济活动中守信用、重契约的法律意识非常引人注目。他们已经不是仅仅局限于在道德意义上强调自身的诚信交易,而是十分讲究使用法律手段保证诚信原则的实现了。家规中所提供的此类史料在正史、法典等一般官方文献中是很难见到的,因此,有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缺乏信用制度资源的误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历代家规中有关家庭、个人社会信用和商业信用的内容极为丰富,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还有待于人们去深入挖掘。就制度而言,家规中的信用规范如此细密、严谨,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经济活动已经十分注重信用问题,由此也可以论定,无论是民间法(家规),还是国家法,中国古代社会都不乏交易信用的法律资源。就思想而言,家规所体现的信用观念则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就以汪辉祖与美国历史名人本杰明·弗兰克林的信用思想为例,后者的箴言是:“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10](第33-35页)]显而易见,弗兰克林的话语里充满了对金钱的渴望,毫不掩饰其诚实守信的自利目的。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评论的:“弗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诚实有用,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守时、勤奋、节俭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按逻辑往下推理,人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在弗兰克林看来,假如诚实的外表能达到相同的目的,那么,有个诚实的外表就够了;过多的这种美德只是不必要的浪费。”^[10](第36页)]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汪辉祖的家训中,同样教人诚实守信,却没有追逐金钱的狂热,没有丝毫“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的意念,而清白做人、公平交易、诚信守家的目的是留下一世清名,留给子孙一分“后福”。显然,弗兰克林的话“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而汪辉祖家规所体现的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就诚信观念的价值取向而言,一个是贪婪的进取,一个是淡泊的守成,这种差别或许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两个民族的不同历史走向吧!

参考文献:

- [1]黄寿祺.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陆林.中华家训[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 [3]袁采.袁氏世范[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 [4]汪辉祖.双节堂庸训[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6]周秀才.中国历代家训大观[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7.
- [7]成晓军.宰相家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 [8]成晓军.名儒家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 [9]费成康.中国的家族法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 [10]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